



非行青年情緒、自尊與 危險因子區辨之研究

蔡宗晃*、蕭美齡**、臧宥熏***

要目

壹、緒論	二、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之敵意比較
貳、文獻探討	三、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之焦慮比較
一、非行行為及非行青年的定義	四、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之憂鬱比較
二、非行行為之犯罪心理學理論分析與整合	五、心理特質判別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差異之有效區別率
參、研究方法	伍、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對象	一、瞭解非行青年的情感性障礙及介入治療的可能性
二、研究步驟	
三、研究工具及測量	
肆、研究結果	
一、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之自尊比較	

DOI : 10.6460/CPCP.202604_(43).0004

* 佛教大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成癮戒治中心主任、慈濟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助理教授、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

** 佛教大林慈濟醫院身心醫學科專科護理師、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碩士。

***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生、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二、提昇非行青年社會之自我價值感及感受能力

三、學習人際溝通與社交技巧訓練

四、以攻擊替代訓練 (Aggression Replacement Training) 改善負面情緒之因應策略

陸、研究貢獻與限制

摘要

以犯罪心理學理論為本研究架構，探討非行青年的個人屬性、個人對自尊、認知及在負向情緒上與一般青年的差異情形，並建立對服役青年產生非行行為的危險因子，期降低非行行為的發生率及提供輔導策略。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為服役中違反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接受輔導教育等非行青年 106 人及一般青年 147 人，採問卷調查法，以 Buss-Durkee 敵意量表、狀態－特質焦慮量表、貝克憂鬱量表及 Battle 的自尊量表作為研究工具。研究結果：非行青年的教育程度較低、有較多的暴力行為、犯罪紀錄及前科次數；社會自尊較低，顯示其自我價值感及社會互動不佳；狀態焦慮較低、憂鬱程度較高，近半數有輕度憂鬱程度以上，且較具敵意及反抗性。依據教育程度、犯罪紀錄、敵意、懲罰紀錄、社會自尊、攻擊性、憂鬱及疑心等變項可區辨 93.7% 非行青年，結果僅具區辨解釋性，尚不足以應用於預測未來個體。研究結論：本研究結果將可作為輔導的調整因子，並作為委託專業諮商輔導機構實施心理衛生教育的輔導策略。

關鍵詞：非行青年、焦慮、憂鬱、敵意、自尊

Affective Factors, Self-esteem and Risk Marker Analysis on Deviant Youths

Tsung-Huang Tsai* & Mei-Ling Hsiao** &
You-Syun Zang***

Abstract

Purpose: Guided by criminal psychology theorie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eviant youths and ordinary youths in terms of personal attributes, self-esteem, cognition, and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and further identified the risk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delinquent behaviors among conscripted youths. The ultimate aim wa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delinquency and to provide counseling strategies.

Methods: Participants included 106 deviant youths who violated the regulations of alternative military service and

* Ph.D., Graduate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riminolog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dicine, Tzu Chi University; Director, Addiction Treatment Center,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Buddhist Dalin Tzu Chi Hospital.

** M.S., Department of Nursing, Hungkuang University; Nurse Practitioner,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Buddhist Dalin Tzu Chi Hospital.

*** Master's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received counseling education, and 147 ordinary youths.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employing the Buss-Durkee Hostility Inventory (BDHI), 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The Beck Inventory (BDI-II), and Battle's Self-Esteem Scale as research instruments.

Results: Deviant youths were found to have low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more violent behaviors, a higher number of criminal records, and more prior convictions. They also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social self-esteem, suggesting poorer self-worth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In addition, deviant youths reported lower levels of state anxiety but higher levels of depression, with nearly half experiencing at least mild depression. They also displayed stronger hostility and resistance.

Based on variables such as educational level, criminal record, hostility, disciplinary/punishment record, social self-esteem, aggressiveness, depression, and suspiciousness, 93.7% of participants into deviant or ordinary youth groups can be distinguished. The results are discriminative and explanatory only and are insufficient for predicting future individuals.

Conclusions: Th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adjustment factors for counseling interventions and serve as a basis for entrusting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institutions to implem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trategies for deviant youths.

Keywords: deviant youths, anxiety, depression, hostility, self-esteem

壹、緒論

時下的青年，生活在快速變遷的社會，因為工商業的發達、都市人口的過度集中以及少子化帶來的同儕競爭、情感疏離等因素，他們可能會面臨例如經濟、感情、升學、家庭、就業、交友、同性戀、自殺、藥物濫用、卡債、憂鬱症等不同的壓力與問題。當青年處於就學階段時，這些壓力與問題可以尋求家長、老師及朋友的協助，以得到紓解，一旦離開家庭、校園，這樣的庇護便顯得薄弱，很多時候需要自己獨自負起責任，加上兵役法規定，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因此，除達到免役或禁役規定者，皆須服兵役（國防部，2009）。服役青年處於人生階段的過渡期，甫脫離家庭與校園等相對具備支持性的環境，進入一個強調紀律與權威的制度性空間，其心理調適與壓力因應機制可能與青少年或一般成年族群截然不同。生活環境的巨大改變，本來較為自由的生活環境變成凡事都得依團隊規範而服從命令，造成少部分的服役青年，在面臨上述問題時無外來資源可供因應，服役環境又再給予更大的壓力，因此無法接受服勤管理模式，產生適應不良狀況導致偏差行為產生。

輔導機構為導正這些服役中具偏差行為的青年改過向上，增進其適應服勤環境能力暨解決社會問題，對於有下列行為之對象：包括違反紀律，服勤怠惰，屢犯不堪教誨累計記過三次、罰薪懲處者、未經准假擅離服勤訓練或指定住所三日以上者、酗酒滋事暴力鬥毆者，將施以輔導再教育（教

育部，2005）。輔導機構常藉由生活行為管控及情緒管理並行方式來糾正其偏差行為並予以正確的現實生活觀念，期許其能適應日後社會團體生活。

非行行為的形成具多重面向，包括個人的生理條件、成長之歷史背景、社會文化氣氛、個人之抉擇，還有其心理內在素質等許多因子的影響產生。基於上述服役青年的偏差行為問題，本研究企圖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切入，來了解非行青年本身的特質、對自我的認知（自重感）及負向情緒的感受，作為輔導的介入因子，亦可作為諮商機構及實施心理衛生教育的輔導策略。

貳、文獻探討

一、非行行為及非行青年的定義

非行行為在傳統犯罪學上定義為偏離了社會所公認之行為規範、與傳統社會價值觀、信仰的行為相衝突，並且侵害到社會公益。自社會整體公益之立場，以普遍的倫理道德觀念加以理性分析，而判斷此行為是否違反當時當地社會所接受之行為標準而定，其範圍廣泛，從暴力犯罪到隨地亂丟垃圾等都包含在內。

然依據役政署對於非行青年參與輔導教育的辦法，乃根據教育部（2005）《替代役男獎懲辦法》第十三條之規定，替代役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輔導教育：

1. 累計記過三次以上。
2. 未經准假，擅離服勤、訓練或指定住宿場所累計三日以上。
3. 酗酒滋事或暴力鬥毆，致生嚴重後果。
4. 擔任管理幹部，利用職權欺凌屬員，情節重大。
5. 蓄意威脅、惡意詆毀、不服從監督長官或管理幹部之指揮、管教，情節重大。

本研究以上述五項服勤違反規定，作為偏差行為之操作定義，用來區別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的不同。因此，本研究之非行青年乃違反上述五項服勤規定且藉由服勤機構轉介至役政輔導中心施予輔導教育者。

二、非行行為之犯罪心理學理論分析與整合

為了瞭解非行青年其個人屬性、自尊及負向情緒在犯罪心理學所擔任的要素，故將傳統犯罪心理學理論統整如下：

(一) 對個人屬性與環境的看法——社會認知論

對於環境中的威脅、挫折，以及自我因應能力的錯誤認知，往往是形成非行行為的開始，社會認知論對非行行為即持此種看法，當個人對情境的評估認為是具威脅性的，或者以為他人意圖對自己有言語或肢體上的汙辱，可能是引發其非行行為反應的主要原因（Lazarus, 1991）。通常使用暴力的人是因其不適當地知覺到外在環境的敵意（Dodge et al., 1990）。若與非攻擊性的青年作比較，發

現攻擊性較強的青年傾向於相信他人對他們有敵意，且對自己攻擊行為的結果有正向的預期，亦即具有高度攻擊性的青年常有「歸因謬誤」（Attribution Biases）等社會認知困難，容易在模糊曖昧的情境中對他人的意圖做出錯誤的詮釋（Dodge, 1985）。

(二) 自尊與非行行為的關係——人本自我理論

奠基於人本心理學觀點，自我理論（Self Theory）認為個體的行為乃其自我概念（Self-concept）之表達，因而自我概念在非行行為的形成與發展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Reckless & Dinitz, 1967）。

自我肯定則源自於對自我能力與社會接納的信念，當個體處於低自我肯定的狀態時，無法從正規社會中獲得認可，則傾向尋求替代性方式以滿足此需求（Maslow, 1970）。即透過非主流的途徑尋求肯定，而非行行為可能因此成為補償性的行動策略。部分非行青少年傾向從偏差同儕團體中獲得接納與認同，進而藉由偏差或暴力行為來強化自我肯定（Kaplan, 1980）。

過去研究多支持低自尊與非行行為具相關性，Rogers 認為，缺乏正向自我關懷與心理問題息息相關，可能導致攻擊行為；而新佛洛伊德學派如 Horney 與 Adler 則指出，自卑感來源於童年時期的拒絕經驗，進而形成反社會行為傾向。Rosenberg 進一步認為，低自尊會削弱個體與社會的聯結，使其更易違反社會規範，增加偏差行為風險（Baumeister

et al., 2000; Donnellan et al., 2005)。低自尊與偏差行為相關研究並非侷限於西方社會，Hu 等人（2023）以中國青少年為樣本發現，自尊水準較低者較易對外界負面刺激產生過度反應，進而引發如嫉妒與怒氣等情緒反應，並降低自我控制能力，最終增加攻擊行為的發生風險。然而亦有觀點認為偏差行為導致社會孤立，進而降低自尊（Dishion et al., 1991），顯示兩者間並非呈現單一線性模式，而是受到自尊型態、個人特質與情境脈絡等多重因素交互影響。

然而亦有研究顯示高自尊與攻擊行為相關，此類個體可能基於過度膨脹的自我認知與權力渴望，尤其當其伴隨自戀特質時，甚至可能增加攻擊行為風險。Amad 等人（2020）研究顯示，自戀型自尊與主動型攻擊行為（proactive aggression）呈顯著正相關。

綜上所述，低自尊與高自尊似乎與非行行為皆呈現相關，依研究的測量方法、研究對象的年齡、文化差異等因素而有不同結果。而綜觀相關與非行行為、自尊之間的研究多以整體自尊為構念，然而自我本身具有多面向，自尊基本可細分為五要素，社會自尊、學業自我效能自尊、家庭自尊、身體意象自尊以及整體自尊（Pope et al., 1988）。其中，社會自尊指個人對自己在社會群體中的價值、能力和接受程度的整體評價。鑑於自尊並非單一面向之概念，本研究試圖解析其內部結構，進而探討不同構面在解釋偏差行為時所可能展現的差異性作用。

（三）挫折產生負向情緒與偏差行為——心理分析論

由心理分析理論衍生的「挫折—攻擊假設」（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Dollard et al., 1939），主張個人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受到阻礙或得不到他所期待的報酬，便會產生一種不舒服的情緒（憂鬱或焦慮）喚起或憤怒狀態，稱為「挫折」（Frustration），必須獲得立即的紓解，而偏差行為（攻擊）則是紓解此一不舒服喚起狀態的嘗試。此外，在犯罪學領域中與心理學相關之理論最廣為人知的為一般化緊張理論（General Strain Theory, GST）。GST 認為青少年在經歷「壓力（strain）」和「負面情緒」時，其犯罪傾向的風險會增加。這些負面情緒，包括憂鬱，源於不同形式的壓力（如壓力本身和焦慮）（Agnew, 1992）。情緒被定義為個體在特定刺激下所產生的心理與生理激發反應。眾多研究已指出，負向情緒與青少年的非行行為之間存在顯著關聯。Fredrickson 與 Branigan（2005）認為，憂鬱情緒會削弱青少年對自我效能的信念與未來的正向期待，並傾向使用低效能的策略來因應情緒困擾，進而增加非適應性行為的可能。

憂鬱情緒甚至會影響到青少年的品性行為，實徵研究也進一步支持憂鬱情緒與偏差行為間的關聯性。Punia、Jangra 與 Phor（2024）招募 200 名年齡介於 14 至 18 歲青少年學生，分別施測憂鬱及犯罪傾向量表，結果發現犯罪傾向和憂鬱呈顯著正相關；Lahey、Loeber 等人（2002）發現青少年與青年人之憂鬱症狀與偏差行為常呈現共存關係，情緒狀態的變化亦可能影響其偏差行為的表現。Cutrona、Halvorson 等人

(1996)則發現，不論性別，偏差行為皆能有效預測後續憂鬱症狀的發生，顯示兩者具有交互影響的潛在風險。儘管憂鬱與非行行為間的相關性已有諸多實證支持，惟其因果關係尚未獲得一致結論，雙方可能互為影響，呈現交互作用模式。

敵意部份 Brodsky (1988) 及 Smith (1992) 將此定義為三種敵意情緒的複合體 (hostility complex) 包括如憤怒之情緒成份、敵意之認知成份、攻擊之行為成份。研究亦發現，犯罪人的犯罪傾向，基本上是由衝動性與憤怒、焦慮、暴躁等負面情緒結合而成，有這類問題的人，平時生活就比別人感受到更大威脅與不安，一旦無法適當調整衝動性時，很快就會將這些負面情緒表現於行動上，而出現或做出偏差犯行 (林山田、林東茂、林燦璋，2007)。

(四) 行為的增強——社會學習理論

社會學習論強調人們的行為是心理社會環境下的產物，由人們所居住生活的社會環境中學習模仿而來，非行行為亦同。當非行行為的產生可以使得其憤怒或是嫌惡的狀態排除，則該行為將受到負向增強而持續 (Blackburn, 1993)。除了受到行為本身的增強作用，非行行為的持續也肇因於攻擊者未能透過直接經驗或替代經驗學習到以非偏差行為的方法來因應嫌惡事件或獲得預期的酬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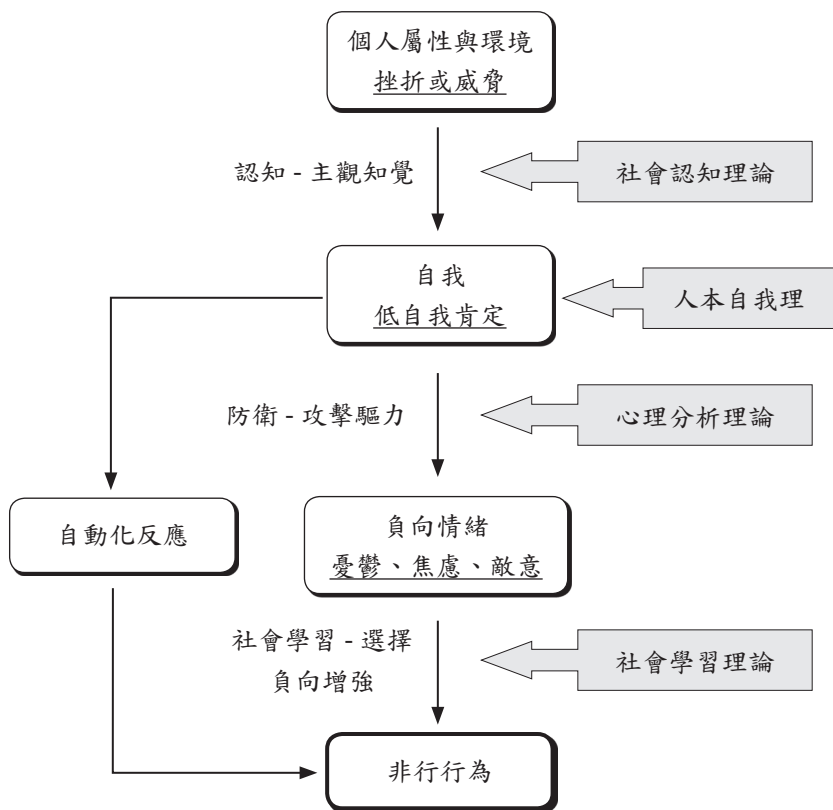
(五) 自動化的行為反應

另一方面，非行青年的自動化反應，乃是青年因表現偏差及攻擊行為而獲得了權力感和控制感，在同儕團體的社會獲得讚許，隨之而來的愉悅滿足，則提供了最大的正面增強效應，進而提升了青少年的自我肯定感和自我價值感。然而，此一高度的自我肯定狀態並不穩定，使得青年需要一再地依賴非行行為來加以維繫；於是，非行行為將成為目標導向行為或青年遭遇環境事件刺激的自動化反應，而持續的出現，形成其慣性違常行為傾向。

(六) 整合理論之非行行為模式研究架構

從上述各心理學理論觀點，本文將之加以整合，提出非行行為模式研究架構。了解個人及環境的屬性、自尊及情緒因果在非行行為上擔任其重要的因子 (圖 1)。在生活中經常遭受挫折的青年，由於難以獲得他人的肯定與讚賞，將導致其擁有較低的自我肯定，而此自我肯定容易讓他們對外在環境的挫折有錯誤的認知，認為是具有敵意的，並產生負向情緒。由於這類青年缺乏適當的情緒管理與社會技巧，將會衝動的選擇由社會學習歷程習得的非行行為，來減輕挫折與負面情緒。最後當從事非行行為後減輕了那些不舒服感與情緒，便產生了負向增強效應，使其一再重複那些非行行為。

圖 1
整合理論之非行行為模式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檢驗這些非行青年在自尊、憂鬱、焦慮與敵意等情緒上是否有明顯差異？另外，若依據個人屬性、各自尊面向、憂鬱、焦慮與敵意等變項是否可以顯著區別出非行青年的特質？並希望藉由研究之發現提供相關單位對非行青年的心理輔導方向。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對象為服役中違反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違規行為嚴重者之青年為本研究非行青年之操作定義，此受測非行青年組母群體以立意抽樣原則選取受測樣本，為本研究期間參與輔導教育者，並限以二十歲至二十五歲之服役青年、國小程度以上，需有能力辨識字義而作答者，共計 113 人，經研究者檢查問卷後，剔除其中具有說謊反應傾向、任意亂填、背景資料拒填與不合格受測者後得有效樣本，共計 106 份，回收率 93.8%。對照組為正在接受訓練之一般服役青年，利用新兵訓練期間，接受入伍訓練之役男在接受「適性測驗」時，以隨機抽樣 150 人施測，同樣剔除有說謊反應傾向、任意亂填、資料拒填與不合格受測者後，回收有效樣本 147 份，回收率 98.0%。

表 1
研究樣本之人口變項人次及分配比例

變項	非行青年 (106)	一般青年 (147)
	次數 (%)	次數 (%)
年齡		
20-23	98(96%)	38(56.7%)
23-24	4(4%)	29(43.3%)
平均	21.87	23.65

表 1 (續)

變項	非行青年 (106)	一般青年 (147)
	次數 (%)	次數 (%)
教育程度		
國中	45(43.7%)	0(0%)
高中	46(44.7%)	2(2.9%)
大專	7(6.8%)	1(1.4%)
大學	5(4.9%)	66(95.7%)
暴力行為		
沒有	77(74%)	99(97.3%)
有	27(26%)	4(2.7%)
前科次數		
0	65(61.3%)	145(98.6%)
1	22(20.8%)	2(1.4%)
2	12(11.3%)	0(0%)
3	7(6.6%)	0(0%)
犯罪紀錄		
沒有	41(38.7%)	145(98.6%)
有	65(61.3%)	2(1.4%)

受測者背景資料 (表 1) 略述如下：非行青年服役年齡較輕，大多介於 20-23 歲 (96%)；其教育程度較低，大多為國中學歷 (43.7%)、高中學歷 (44.7%)，相對於一般青年為大學以上學歷 (95.7%)；他們有明顯較多的暴力行為 (26%)，而一般青年只有極少數具暴力行為 (2.9%)；有 61.3% 的比率具犯罪紀錄、38.7% 具前科紀錄，相較之下，一般青年僅少數具前科紀錄 (1.4%)。兩組差異除了反應出其潛在的智能表現外，亦可能在其青春期的學校生活已出

現了適應障礙；而非行青年有較多有犯罪前科紀錄，且發現非行青年之品行違規可能有高度重複違犯之情形。

二、研究步驟

自民國九十四年一月至九十七年六月期間，共計三年六個月，依台灣當時替代役男的服役期間為兩年，凡經由各服役單位召開會議審核確認符合接受輔導對象者，成為本研究之非行青年組受試者 (即為全國替代役接受輔導教育之母群體)。參與本研究之替代役男皆簽署知情同意書，且研究全程保障資料保密與匿名處理，並於研究後相關資料予以銷毀。

由研究者親自檢閱這些青年違反紀律，服勤怠惰，屢犯不堪教誨累計記過三次、罰薪懲處者、未經准假擅離服勤訓練或指定住所三日以上者、酗酒滋事暴力鬥毆者等偏差行為事實之後，並請身心醫學科醫師進行個案身心診斷，刪除其中可能精神疾患者，而後研究者於特定輔導機構心理測驗室施測。對照組為正在接受新兵訓練之一般服役青年，在其接受「適性測驗」時，以隨機抽樣施測取得樣本。

三、研究工具及測量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來進行資料蒐集及研究，所採用之工具稱為「台灣地區青年情緒及自尊評估量表」。其問卷內容包括五大部分，茲分述如下：

(一) 個人基本資料表

此部分包括：性別、年齡、服役（目前）之職業、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兩性關係、犯罪紀錄包括曾犯行且執行罪刑及次數。

(二) 自尊量表

以 James Battle 在 1992 年所修訂的「Culture-Free Self-Esteem Inventories Form AD for Adult」，在國外它常被例行地使用在諮商的實務上，被發現可以有效測量出影響情緒的狀態。原量表包含三個分量表：一般自尊（個體本身價值的整體感受）、社會自尊（個人對同儕間關係的品質感受）及個人自尊（個人對自我價值最內在的感受）。量表分成高自尊和低自尊，受測者對每一題的回答只有是或否，並設有反向題。自尊量表得分愈高，表示其自尊等級愈高。本量表曾以中正大學之學生為施測對象，獲得有效樣本 520 份，並以 t 檢定考驗其自尊高分與低分組，兩組在自尊量表上之得分達顯著差異，代表此自尊量表之題目可以區分出得分高低之不同群體；經因素分析後，此自尊量表可分為五個層面，分別為「自我認同」、「自我肯定」、「自我人際」、「自我情緒」及「自我價值」，採用 Cronbach's coefficient Alpha 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得總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 0.88；而整個「自尊量表」之五個層面能有效解釋量表的總變異量為 48%。

(三) 敵意罪惡感量表

以 Buss, A. H. 與 Durkee, A. 在 1957 年所發展出來的巴—德敵意量表（Buss-Durkee Hostility Inventory，簡稱 BDHI）。原量表共有 75 題分為 8 個分量表，包括攻擊性、間接敵意、易怒、反抗行為、怨恨、疑心、言語敵意及罪惡感。經因素分析找出兩個最主要的因素：經驗性敵意——包括疑心及怨恨分量表；表達性敵意——包括攻擊性及言語敵意分量表。此量表的修訂係採用國內張琦、張永源（1994）所修正，選出因素負荷量大於 0.3 的題目共 55 題，共可解釋 36% 的變異量。經 Cronbach's coefficient Alpha 係數測得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 0.87。

(四) 狀態—特質焦慮量表

狀態—特質焦慮量表（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簡稱 STAI）是由 Vanderbilt University 和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的三位教授 Charles D. Spielberger；Richard L. Gorsuch & Rubert E. Lushene 於 1970 年共同編訂的兩個量表。Cattell 與 Scheier（1961）提出狀態—情緒焦處理論，認為焦慮是一種暫時性的情緒狀態，也可能是一種較持久穩定的人格特質。前者稱為狀態焦慮，其特徵為對緊張、憂鬱、自主神經系統亢奮感覺主觀，有意識的知覺，藉以測試受測者處於壓力情境下焦慮程度的反應；後者稱為特質焦慮，乃個人知覺到威脅性情境時長期狀態其情緒的特質。另一方面，Raine 等（2006）研究攻擊行為及焦慮情緒之間的關連，結果顯示反

應性攻擊行為 (reactive aggression) 會與特質焦慮有顯著相關，且反應性與自發性攻擊行為 (proactive aggression) 都與社會焦慮有顯著相關。

量表中文初稿由鍾思嘉教授翻譯，本量表的信度，是以建立常模的同一樣本進行 Cronbach Alpha 信度分析。情境焦慮再測信度為 0.737，特質焦慮再測信度為 0.755。Cronbach Alpha 信度：情境焦慮為 0.898，特質焦慮為 0.859。

(五) 貝克憂鬱量表

貝克憂鬱量表第二版 (The Beck Inventory – Second Edition, 簡稱 BDI-II) 是一份用來測量 13 歲以上青年及成人憂鬱嚴重程度的工具。本量表共有 21 組句子，由受測者本人自行填答。BDI-II 的總分計算方式，是將 21 組題目內每一組受測者選擇選項的數字加出總分而得。BDI-II 總分的最低分是 0 分，最高分是 63 分。針對憂鬱嚴重度以下列 BDI-II 總分切截分數來分辨嚴重程度：BDI-II 為 0 ~ 13 分，正常範圍；14 ~ 19 分，輕度憂鬱；20 ~ 28 分，中度憂鬱；29 ~ 63 分，重度範圍。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主要發現分別敘述如下：

表 2

一般青年與非行青年獨立樣本平均數差異檢定摘要表

變項類別	非行青年	一般青年	t 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一般自尊	9.23(3.63)	9.95(3.45)	-1.6
個人自尊	3.75(2.19)	4.36(2.29)	-1.78
社會自尊	5.07(2.41)	6.40(1.87)	-5.22**
自尊總分	18.05(7.29)	18.49(9.22)	-4.48
憂鬱程度	14.68(10.75)	8.00(7.31)	4.517*
攻擊性	3.74(2.15)	1.53(1.26)	7.94**
間接攻擊	2.90(1.57)	2.12(1.12)	3.53**
易怒	4.00(2.14)	2.24(1.96)	5.09**
反抗行動	3.42(1.22)	2.75(1.17)	3.57**
怨恨	3.83(1.88)	2.91(1.76)	3.23**
疑心	3.15(2.00)	1.30(1.47)	6.58**
言語敵意	3.87(1.75)	2.65(1.45)	4.80**
敵意程度	31.24(10.66)	21.34(7.41)	6.71**
狀態焦慮	43.90(8.58)	46.32(6.08)	-2.03*
特質焦慮	44.31(7.46)	45.38(5.78)	-1.261
罪惡感	6.34(2.27)	5.90(1.63)	1.86

*P < .05 **P < .01

一、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之自尊比較

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在社會自尊上有顯著差異 ($t = -5.22, p < .01$)，雖然非行青年之自尊低於一般青年，但在一般自尊及自尊總分上，沒有顯著差異。這樣的結果呼應了前面提到的偏差行為之自動化反應，個人的社會自尊低落，

可能顯示其自我價值感低、與社會互動不佳，這種情況下，個人容易使用偏差行為來引起他人之關注，提升自我價值感，最後便使得其個人與整體自尊提高，與一般青年並無明顯差異。

二、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之敵意比較

非行青年比一般青年在敵意的總分上有顯著差異 ($t = 6.71, p < .01$)，其中在攻擊性 ($t = 7.94, p < .01$)、間接攻擊 ($t = 3.53, p < .01$)、易怒 ($t = 5.09, p < .01$)、反抗行動 ($t = 3.57, p < .01$)、怨恨 ($t = 3.23, p < .01$)、言語敵意 ($t = 4.80, p < .01$) 及疑心 ($t = 6.58, p < .01$) 等項目上較為顯著，但其罪惡感 ($t = 1.86, p = .063$) 並未具顯著。

三、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之焦慮比較

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在狀態焦慮上分別有明顯的差異 ($t = -2.03, p < .05$)，顯現非行青年在壓力情境下較不焦慮。在特質焦慮上沒有明顯差異 ($t = -1.261, p = .209$)，甚至有比一般青年低的情形，但無統計上差異。

四、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之憂鬱比較

表 3

一般青年與非行青年憂鬱程度比較

	憂鬱程度				總和
	正常	輕度	中度	重度	
非行青年	54(51.4%)	17(16.2%)	19(18.1%)	15(14.3%)	105
一般青年	120(81.2%)	19(13.0%)	4(2.9%)	4(2.9%)	147
總和	174	36	23	19	252

$\chi^2=4.52; p < .05$

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在憂鬱程度上有所差異 ($t = 4.517, p < .05$)。非行青年中近半數有輕度以上憂鬱狀態 (輕度憂鬱：16.2%；中度憂鬱：18.1%；重度憂鬱：14.3%)，相對於一般青年 (輕度憂鬱：13.0%；中度憂鬱：2.9%；重度憂鬱：2.9%) 其憂鬱程度較為普遍且嚴重。

五、心理特質判別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差異之有效區別率

表 4

區別分析的區別函數係數、組重心值

區別變數	標準化區別函數係數
教育程度	.943
懲罰記錄	-.297
犯罪紀錄	-.287
憂鬱程度	.954
敵意程度	.464

表 4 (續)

區別變數	標準化區別函數係數
社會自尊	.501
攻擊性	-.438
疑心	-.391
各組重心	
非行青年	-1.831
一般青年	1.408

表 5

預測歸類組別

預測歸類組別			
原始歸類組	非行青年	一般青年	總和
非行青年	95(89.6%)	11(10.4%)	106
一般青年	5(3.4%)	142(96.6%)	147
歸類正確百分比 93.7%			

以區別函數去區分一般青年與非行青年時區別出一個特徵值為 3.627 的區別函數，其典型相關值為 .885，由 Wilks' Lambda (Λ) 值 .216 可知此區別函數的解釋能力達到顯著水準 ($p < .001$)，正確區別率高達 93.7%，其中非行青年被正確分類率為 89.6%，一般青年被正確分類的機率有 96.6%，兩組被正確區分的機率皆有高出 80% 以上；從變項的區別函數係數可以找出最具區別效力的變項，「教育程度」、「犯罪紀錄」、「敵意程度」、「懲罰記錄」、「社

會自尊」、「攻擊性」、「憂鬱程度」、「疑心」等變項有顯著的區別能力，其中尤以教育程度 .943 及憂鬱程度 .954 和自尊總分 .501 最具區辨效力，顯示教育程度、憂鬱程度及社會自尊是決定青年偏差行為的主要區別變項。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非行青年在服役期間表現出相對較低的教育程度、較多的前科與紀錄處分、憂鬱程度顯著偏高，且社會自尊顯著低於一般青年。此一現象可能反映出，部分非行青年自青少年時期即難以適應正規教育體系，並在學校生活中頻繁出現規範違反與暴力傾向，進而影響其社會化過程與情緒調節能力的養成。學校除了是知識習得的場域，更是社會化的重要媒介。Kick (1992) 根據文獻整理發現非行青少年的自尊狀態與低學業成就等學業表現不佳的青少年，常因無法達到學業成就的社會期待，而產生低自我效能與價值感，進而降低其整體自尊水平。雖然本研究結果顯示，非行青年在自尊量表上的得分與一般青年之間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此發現與多數研究非行青少年強調低自尊與非行行為具有相關性的結論並不一致。

本研究發現，非行青年的社會自尊顯著低於一般青年。研究者推測，非行青少年在進入青年時期後，雖然脫離了學校與家庭環境中因學業或家庭功能失衡所造成的低自尊因素，但由於其成長歷程缺乏正向學習經驗與社會認可，因而

傾向轉向非主流團體以尋求歸屬與接納。在這樣的過程中，他們因受挫而產生負面情緒，並可能藉由從事非行行為來滿足自尊的需求。這一點與 Walz 與 Bleuer (1992) 的研究結果一致：無法透過正當途徑提升自尊的學生，在青年時期更容易以偏差行為作為因應方式。此現象符合本研究所建構的自動化反應觀點，即青年透過偏差與攻擊行為獲得權力感與控制感，並在同儕群體中得到肯定與讚許。隨之而來的愉悅與滿足提供了強大的正向增強效應，進一步提升了其自我肯定與自我價值感。

而研究雖發現個體社會自尊高低與非行行為間存在顯著相關，但多數研究仍以整體自尊為主，未專注於社會層面的自我評鑑。社會自尊 (Social self-esteem) 是個人對自己在社會群體中的價值、能力和被接納程度的整體評價，體現了與他人互動時的自信與認同感。它受到人際關係、社會比較、社會地位及群體歸屬感等因素影響。社會自尊高的人在社交場合更自信，容易建立健康人際關係並參與團體活動；反之，社會自尊低者可能感到焦慮、孤立，甚至迴避社交。總體而言，社會自尊是整體自尊的重要組成，反映個人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與價值。根據艾瑞克森提出的社會心理發展階段認為，個體在青少年亦或青年時期，主要面臨的挑戰為同儕間的認同 (程淑華、施壹騰, 2018)，相較伴侶、父母，同儕關係是否滿意為此階段最重要的發展任務，因此個體的社交品質將影響社會自尊之發展。本研究以服役青年為施測對象，此制度具高度階層性與規則性，且人際互動密集，對

個體的社會適應能力形成強烈挑戰。對非行青年而言，社會自尊在服役機構中可能深刻影響其行為表現，例如服從規範的意願、人際互動的品質，甚至是否產生反抗心理等層面。服役機構本身是一個高度結構化、講求紀律與集體一致性的環境，非行青年在進入此種制度化團體時，常因角色適應困難與人際互動受限而感到格格不入。這種社交適應上的壓力與疏離感，可能削弱其對自身社會角色的肯定與歸屬感，進而導致其社會自尊低落，顯著低於一般服役青年。

非行青年的敵意攻擊程度也高於一般青年，而狀態焦慮程度卻低於一般服役青年。此與反社會人格者行為模式相似，具有高攻擊及衝動傾向，但對外在壓力威脅處於麻痺狀態，以至於遭逢威脅時呈現奮不顧身的情勢。本研究結果顯示，雖然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在「狀態焦慮」上存在顯著差異，但在「特質焦慮」上則未達顯著。根據 Barnes 等人 (2002) 之回顧性研究指出，狀態焦慮相較於特質焦慮，其心理測量穩定性較低，較易受到場域影響所干擾。因此，不可排除在施測當下之作答情境 (如：處於輔導機構內、面對規範壓力、或不確定的環境氣氛) 可能對非行青年之狀態焦慮測量結果產生影響。鑒於本研究之非行青年多數安置於輔導機構中，屬於相對封閉、結構化與保護性的環境，可能在短期內降低其外顯焦慮反應，導致其「狀態焦慮」得分偏低，進而與一般青年產生顯著差異，期許未來相關研究進行更廣泛變項影響分析。

非行青年在憂鬱量表上亦高於一般青年，於國外學者研究中結果一致，Edelbrock 與 Achenbach (1980) 發現青少年往往同時展現偏差行為，而具有偏差行為的青少年也多伴隨憂鬱症狀。Lahey 等人 (2002) 研究顯示，若能有效減輕青少年的憂鬱情緒，偏差行為的表現便能獲得明顯改善。在部隊中，因無法適應軍中規範與壓力情境，部分服役青年可能產生顯著的心理困擾，進而發展為軍中適應障礙症，其症狀可能包含焦慮、憂鬱、行為偏差，甚至自我傷害行為 (洪應慈、馮煥光，2006)。李旻苙等人 (2021) 之研究亦指出，相較於一般服役青年，患有軍中適應障礙者在憂鬱情緒的表現上明顯偏高。由此觀之，本研究中之非行青年其憂鬱得分顯著高於一般青年，可能亦與其軍中適應困難相似。

本研究與李旻苙等人 (2021) 研究結果一致，非行青年原本即具備較高比例的前科紀錄、教育適應困難與人際衝突經驗，進入部隊後須面對一個非常高度結構化及紀律化且社交壓力強烈的環境，其實容易再度回想其原有挫折經驗與壓力因應困境。此外，非行青年脫離其原有偏差同儕支持系統後，若無法順利與部隊中的同儕建立正向關係，進而產生軍中適應障礙症，並且產生孤立及自我否定的情緒狀態，使得憂鬱程度明顯偏高。

以區別分析法就上述自我認同 (自尊)、情緒及敵意變項進行兩個組別的正確區分率，顯示「教育程度」、「犯罪紀錄」、「敵意程度」、「懲罰記錄」、「社會自尊」、

「攻擊性」、「憂鬱程度」、「疑心」等變項的有效區別率達 93.7%。顯示個人長期的負面特質再加上其負向的情緒對日後發展為非行青年，對於其外顯的偏差行為有區辨性。以促使輔導人員可特別關注，除了對其攻擊行為或敵意態度進行了解，更值得去著眼的是社會自尊較低、憂鬱程度較高的層面的關懷。

針對未來在實務上的應用，本研究建議如下：

一、瞭解非行青年的情感性障礙及介入治療的可能性

本研究結果發現非行青年有近二分之一達憂鬱程度，更應驗處於憂鬱狀態及衝動控制不佳，預測非行行為之發生可能。此為諮商輔導介入的重要契機，若能考慮經由品性違常青年的情緒內在因子，給予適當的治療介入，以改善其憂鬱情緒，減少其衝動與攻擊行為。

二、提昇非行青年社會之自我價值感及感受能力

社會自尊與一個人的歸屬感、被接納以及在群體中的地位緊密相關。非行青年自尊研究結果與大多非行青少年的自尊研究部分，最為突顯在於其社會自尊的低落，建議在治療策略加強如何提升其自我價值感，例如從小處著手，累積個人的成功經驗，發覺及運用個案的優點，進而專注於貢獻自己的價值時而感到更有自信。減少其社會或服勤單位對其負面的標籤，將有助於提升其違常行為的自控能力。本研究中可察覺或許加強其教育程度的提升、減少其懲罰記錄、犯罪紀錄等標籤皆有助於違常行為的改善。

三、學習人際溝通與社交技巧訓練

學習有效的社交技巧，因非行青年普遍有較差的社交互助，在其動機及情境分析有很深的人際衝突與象徵性意義，並呈現較高之情感易變性、抑鬱、自卑及攻擊性不良傾向。因此，強化其社交技巧及人際溝通學習，將有助於其適應日後社會團體生活。

四、以攻擊替代訓練（Aggression Replacement Training）改善負面情緒之因應策略

人與環境之間是互動的關係，如何因應環境所造成之壓力，減少負面情緒轉化為偏差行為的連結，也是輔導非行青年的重點，使用攻擊替代訓練（ART），利用直接的教導、角色扮演和回家作業的訓練，使其從作業中練習社交技巧在現實的生活情境中因應自我的負面情緒，減少偏差行為的產生，特別是暴力行為。

陸、研究貢獻與限制

目前針對非行行為與心理特質的研究多聚焦於青少年族群，特別是在校學生或一般社區樣本；另一方面，另有部分研究則以整體犯罪人口為分析對象，涵蓋不同年齡與背景。然而，針對服役青年族群所進行的系統性心理與行為研究仍付之闕如，且相關研究大多討論服役青年之適應障礙行為，如李旻苙、蔡欣玲（2021）比較服役的適應障礙青年與一般青年，有關其負面狀態與非行行為實務研究為主軸的主題尚未看見，顯示此研究對象受到研究實務上忽略。

因此，聚焦於此一特定族群，有益釐清役政單位或政策制定者提供具體的輔導介入依據，提升輔導實務之針對性與有效性。

本研究針對在同一機構中服役之青年的非行行為與其個人特質、情緒及自尊間相關性研究，受測對象為全國服役機構之非行青年轉介至此一中心，收集歷時三年之久，且在實證科學角度上以同一機構之一般青年為對照組與之比較能避免環境因素對研究所造成之干擾，增加其研究之精準度。

本研究亦為國內首次提及關於軍訓機構內之個體負面狀態與非行行為關聯性之探討，不僅利用初階統計檢定服役之非行青年與一般青年在憂鬱、焦慮、自尊上之差異性，亦使用區別分析所列出非行青年產生的數個重要因子，以期官方重視軍訓機構環境對非行青年的負面狀態有所覺察，並加以預防。

不過本研究仍有些限制之處：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受測對象只限於台灣服役中之非行青年，此研究樣本雖有助於分析高風險非行個體的心理特徵與介入需求，但其結果所揭示的敵意、自尊低落與情緒困擾，可能亦受到制度化處遇、標籤效應或輔導經驗影響，因此，研究結果並非可直接類推至社會上一般的非行青年。

二、研究對「非行」的界定完全依賴制度化標準（即違反替代役規定者），未能進一步考量個體主觀的行為動機、

社會情境或其他偏差行為類型，容易將多面向的非行現象過度簡化，忽略其潛在的心理與社會脈絡。

三、在研究工具方面，雖然所使用之問卷不僅測量情感面向，例如 Beck 的憂鬱量表亦含有身體或生理面向因素，而 Buss 與 Durkee 等人的敵意量表也包括了認知、情感與行為因素，但本研究因著重於各犯罪心理學的驗證，強調情感與自我概念上的差異，因此未將認知、生理等部分納入討論，未來若從事相關研究亦可將此部分一併討論之。

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採取橫斷法研究，對於各變項間之顯著差異無法做出因果關係之推論，因此未來可採用質性研究，已針對其偏差行為歷程，特別是個人所能理解在情緒上及人格上的發展，產生偏差行為的動機及持續性加以分類。

五、本研究運用區別分析以辨識非行與一般服役青年之間的顯著差異，結果需特別強調，本研究為已分類樣本之「事後描述性分析」，主要目的為辨識兩群體間顯著差異之特徵，而非建立具預測能力的風險模型。本研究所得之變項應視為群體區辨特徵，而非可直接應用於實務的風險預測因子。建議若欲發展風險預測模型，仍需納入縱貫資料、潛在變項與更嚴謹的統計建模，以強化其應用效度。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 ☆ 林山田、林東茂、林燦璋（2007）。衝動性與犯罪。載於《犯罪學》。三民書局。
- ☆ 張琦（1994）。冠狀動脈心臟病之行為與性格危險因子之探討。〔碩士論文。高雄醫學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mdn694>
- ☆ 教育部（2005）。《替代役男獎懲辦法》。教育部。
- ☆ 國防部（2009）。《兵役法》。國防部。
- ☆ 鍾思嘉（1982）。修訂情境 - 焦慮量表簡介。《測驗與輔導雙月刊》（10），789-790。
- ☆ 錢淑芬、廖帝涵（2009）。軍隊的階級倫理如何框住人際互動：憲兵義務役士兵的軍事社會化經驗。《復興崗學報》，96，79-106。
- ☆ 程淑華、施壹騰（2018）。網路成癮傾向與社會自尊間的關係探討。《社會與區域發展學報》，5（2），41-74。
- ☆ 洪應慈、馮煥光（2006）。軍中適應障礙症。《當代醫學》，（89），241-247。
- ☆ 李旻苙、蔡欣玲（2021）。服役之適應障礙青年及一般服役青年於衝動控制，復原力與憂鬱之間的差異性研究。《精神衛生護理雜誌》，16（1），18-26。

二、外文文獻

- ☆ Agnew, R. (1992).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30(1), 47-87.

- ☆ Amad, S., Gray, N. S., & Snowden, R. J. (2020). Self-evaluation and Aggression: Different Types of Self-esteem Predict Different Types of Aggression.
- ☆ Barnes, L. L. B., Harp, D., & Jung, W. S. (2002). Reliability Generalization of Scores on the Spielberger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62*(4), 603-618. <https://doi.org/10.1177/0013164402062004005>
- ☆ Baumeister, R. F., Bushman, B. J., & Campbell, W. K. (2000). Self-Esteem, Narcissism, and Aggression.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9*(1), 26-29. <https://doi.org/10.1111/1467-8721.00053>
- ☆ Blackburn, R. (1993). *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John Wiley & Sons.
- ☆ Brodsky, L. S. (1988). *The psychology of adjustment and well-being*. Holt McDougal.
- ☆ Cattell, R. B., & Scheier, I. H. (1961).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Neuroticism and Anxiety*. Ronald Press.
- ☆ Cutrona, C. E., Halvorson, M. B. J., & Russell, D. W. (1996). Mental health services for rural children, youth, and their families. In C. A. Heflinger & C. T. Nixon (Eds.), *Families and The Mental Health System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p. 217-238). Sage.
- ☆ Dishion, T. J., Patterson, G. R., Stoolmiller, M., & Skinner, M. L. (1991). Family, school, and behavioral antecedents to early adolescent involvement with antisocial pee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7*(1), 172-180. <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27.1.172>

- ☆ Dodge, K. (1985). Attributional bias in aggressive children. In P. Kendall (Ed.), *Advances in cognitive-behavioral research and therapy*. Academic Press.
- ☆ Dodge, K., Bates, J., & Pettit, G. (1990). Mechanisms in the cycle of violence. *Science, 250*(4988), 1678-1683.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2270481>
- ☆ Dollard, J., Miller, N., Doob, L., Mowrer, O., & Sears, R. (1939). *Frustration and aggress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 Donnellan, M. B., Trzesniewski, K. H., Robins, R. W., Moffitt, T. E., & Caspi, A. (2005). Low self-esteem is related to aggression,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delinquency. *Psychol Sci, 16*(4), 328-335. <https://doi.org/10.1111/j.0956-7976.2005.01535.x>
- ☆ Edelbrock, C., & Achenbach, T. M. (1980). A typology of child behavior profile patterns: distribution and correlates for disturbed children aged 6--16. *J Abnorm Child Psychol, 8*(4), 441-470. <https://doi.org/10.1007/bf00916500>
- ☆ Fredrickson, B. L., & Branigan, C. (2005). Positive emotions broaden the scope of attention and thought-action repertoires. *Cognition and Emotion, 19*(3), 313-332.
- ☆ Hu, Y., Cai, Y., Wang, R., Gan, Y., & He, N. (202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A moderated chain mediation model [Original Researc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ume 14 - 2023*.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3.1191134>
- ☆ Kaplan, H. (1980). *Deviant behavior in defense of self*. Academic Press.

- ☆ Kick, F. R. (1992). *The self perception of self-concept and self-esteem: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tioch University]. Centerville ohio.
- ☆ Lahey, B. B., Loeber, R., Burke, J., Rathouz, P. J., & McBurnett, K. (2002). Waxing and waning in concert: dynamic comorbidity of conduct disorder with other disruptive and emotional problems over 7 years among clinic-referred boys. *J Abnorm Psychol, 111*(4), 556-567.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111.4.556>
- ☆ Lazarus, R. S. (1991).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in emotion. *Am Psychol, 46*(4), 352-367.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46.4.352>
- ☆ Maslow, A. (1970).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Harper & Row.
- ☆ Pope, A. W., McHale, S. M., & Craighead, W. E. (1988). *Self-esteem enhancement with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ergamon Press.
- ☆ Punia, P., Jangra, S., & Phor, M. (2024). Unveiling Connections between Stres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Delinquency Proneness: Analysing the General Strain Theory. *Open education studies, 6*(1), 104-109. <https://doi.org/10.1515/edu-2024-0013>
- ☆ Raine, A., Dodge, K., Loeber, R., Gatzke-Kopp, L., Lynam, D., Reynolds, C., Stouthamer-Loeber, M., & Liu, J. (2006). The Reactive-Proactive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 Differential Correlates of Reactive and Proactive Aggression in Adolescent Boys. *Aggress Behav, 32*(2), 159-171. <https://doi.org/10.1002/ab.20115>
- ☆ Reckless, W. C., & Dinitz, S. (1967). Pioneering with Self-Concept as a Vulnerability Factor in Delinquency.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 & police science, 58*(4), 515-523. <https://doi.org/10.2307/1141910>
- ☆ Smith, T. W. (1992). Hostility and health: Currents status of a psychosomatic hypothesis. *Health Psychology, 11*(3), 139-150.
- ☆ Walz, G. R., & Bleuer, J. C. (1992). *Student self-esteem: A vital element of school success*.



長刑期受刑人監禁之現況、 衝擊與影響 ——兼論合適處遇之方案

楊士隆*

要目

- | | |
|-------------------------------|-----------------------------------|
| 壹、全球監禁之人數與長刑期受刑人之現況 | 二、受刑人生活在沒出獄希望之禁錮監獄極可能衍生暴行及脫逃等戒護事故 |
| 一、全球監禁之人數 | 三、長期監禁對受刑人家
庭與子女造成巨大
傷害 |
| 二、全球之長刑期受刑人
收容現況 | 四、臺灣監禁率在亞洲
偏高 |
| 三、台灣地區長刑期受刑
人之現況 | 五、長期監禁造成管理
壓力至鉅，監禁成本
高昂 |
| 貳、長刑監禁刑事政策之負
面衝擊 | |
| 一、無期徒刑的受刑人
呈現嚴重的心理健康
問題 | |

DOI : 10.6460/CPCP.202604_(43).0005

*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暨研究所特聘教授、犯罪研究中心主任，台灣刑事司法學會理事長，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政策小組委員。